

# 如愿

《上海文学》50年  
经典·短篇小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丽宏 / 陈思和 / 主编

王蒙 海的梦 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  
冯骥才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阿城 遍地风流  
韩少功 归去来 陈村 一天  
李晓 继续操练 蔡平凹 太白山记  
阿来 群蜂飞舞 梓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高晓声 上海女人

J247.7  
281

# 如愿

## 《上海文学》50年经典·短篇小说

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副主编 杨斌华 金宇澄

编 委 陈思和 韩白骅 金宇澄 卫竹兰 徐大隆 杨斌华 姚育明 张重光 赵丽宏 周立民  
(按姓氏拼音为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愿:《上海文学》50年经典·短篇小说/赵丽宏,陈思和主编.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5617-3448-4

I. 如... II. ①赵... ②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439 号

**《上海文学》50年经典·短篇小说  
如 愿**

**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责任编辑** 阮光页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宜兴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38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1—4100

**书 号** ISBN 7-5617-3448-4 /I · 278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 ——《〈上海文学〉50年经典》总序

陈思和

《上海文学》五十年庆典本来将在沉默中悄然度过,今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美意相助,为我们推出一套庆典丛书。这对艰难中的刊物无疑是雪中送炭,编辑部全体同仁在感激之余深为鼓舞,短短几周里翻遍五十年来近五百本刊物,在历史尘影里寻找当年的雪泥鸿爪。我们分体裁编辑了四卷文选,为前辈们昨天的辛劳留一道光影,为朋友们今朝的努力树立一座丰碑;为20世纪文学史留下几篇佳作,为新世纪的文学铺张未来的道路。这四卷文选为——

第一卷:《如愿》(短篇小说卷)

第二卷:《团圆》(中篇小说卷)

第三卷:《谁曾经宣言》(散文诗歌卷)

第四卷:《得意莫忘言》(理论批评卷)

这四卷一百五十多万言的作品,当然无法概括《上海文学》在半个世纪中所奉献给读者的全部文字精华,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刊物的真实历史的价值所在,也足以引起刊物的新老朋友们的真情而美好的回忆。

《上海文学》的前身是《文艺月报》,创刊于1953年1月,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可以说传统源远流长。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巴金、唐弢、魏金枝、以群、钟望阳、李子云、茹志鹃等都辛勤灌溉过这片园地。它在历史上曾经改名过《收获》、《上海文艺》等。我对它的最初印象是在文革以后,记得它在1977年复刊的时候还没有恢复《上海文学》的名字,而是用了《上海文艺》,据说是忌讳与以前的“文艺黑线”相联系。但是传统是割不断的,上海在1930年代起就风云际会,几度成为现代中国最活跃的文学中心。1950年代以后,上海需要有这样一份杂志来体现文学的群体面貌,于是由巴金先生领衔创办这个刊物,各位资深作家与理论家也以鲜明的个性影响着刊物的风格:唐弢先生是文史专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于是《上海文学》上曾经发表了许多珍贵的鲁迅佚文和学术性的论文;以群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于是我们在刊物上读到了大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如钱谷融先生名重一时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长达数万字,居然也一次性在刊物上登完;魏金枝是位心地宽厚的老作家,他辛勤培养了许多工人作家,编发了他们的处女作,《上海文学》上也留下了这道痕迹。所以,虽然在它创刊后的十三年里,文艺领域斗争之风鼓噪不绝,刊物在恶劣形势下也无法

为繁荣文艺正常工作,但是我注意到了,只要政治风浪稍有平息,作家们立刻就会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上海文学》也是他们传达心声最信赖的场所。从创作上说,1950、1960年代里巴金最好的小说《团圆》,丰子恺最好的散文《阿咪》,吴强、刘知侠、柳青、周而复等在当代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的节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从理论上说,不仅有当时崭露头角而后来俨然一代宗师的蒋孔阳、钱谷融等先生的成名之作,作家秦牧阐释创作规律的名作《艺海拾贝》,翻译家傅雷有限的几篇文学评论,都是在这个刊物上问世的。文革以后,在最初几年里《上海文学》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拨乱反正、清除文革贻害的任务,正是在这破除坚冰、开拓新路的反复、曲折的进步中,《上海文学》已经是一份全国的重要文艺杂志了。李子云老师把这份杂志提升为全国最重要的文艺刊物,当时《上海文学》领风气之先,尤其在理论队伍的建设方面,现在活跃在上海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领域的五十岁上下的文艺评论家,几乎都得到过这份杂志的恩泽、栽培。由于编辑思想的活跃,很多作家都把优秀的作品交给它发表,像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陈村的《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炜的《融入野地》,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作品,许多年过去,我仍然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们全部创作中的最好成就。因此说,《上海文学》是一份分量很重的刊物,它的名字是与许多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名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1990年代后半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已经不再如同1980年代那样风光了,文学受到社会的关注少了,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和繁荣,连过去做文学梦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无须依靠文学刊物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对文学刊物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更重的压力是来自社会关注点的减少。就像一个人经受贫穷的考验并不可怕,但是一旦连社会对他的尊敬也因为贫困而失去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受苦受穷丝毫不值得,信念既倒,一切都会付之东流。文学正是面临了这样的精神上的困境。许多文学杂志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惊慌失措,纷纷施浓脂掩饰旧面貌,献媚眼投靠新市场,文不如文,商不似商,人文精神散失殆尽。《上海文学》则是少数几家能够坚守阵地的文学刊物,但也坚守得很辛苦,周介入先生可以说是为杂志鞠躬尽瘁。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殚精竭虑,想使刊物在不变其文学纯粹性的前提下争取市场与读者,他提出了新市民小说的文学主张,发表了大批贴近当下城镇生活的小说,推出一批文学新人。早在池莉的《烦恼人生》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时候,《上海文学》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文学与市民意识相从过密的创作潮流即将掀起,于是超前地刊登了这篇小说,从而使市民意识与日常生活形态均以自然主义的面貌进入文学创作的主流,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这与《上海文学》在1980年代率先发起为文艺正名讨论、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讨论、寻根文学讨论、小说形式与小说语言讨论等推动了文学创作一样,刊物的思想旗帜又一次感召与引导了文学的潮流。但与前几次刊物率先把文学潮引向先锋意识不同,1990年代《上海文学》随之而亮出的“新市民小说”的旗帜,本意是为了在转型中的文化市场上开拓出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但是这次刊物有意识的抢滩行为并没有获得成功。本来,在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中,流行音乐、影视传播和现代读物应该是鼎足而立,各自形成一套多层次多对象的文化制品体系,来适应日益丰富

和情欲化了的城市市民的需要；而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的模式严重束缚了文化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对文化市场的渗透和影响仍然受到了不该受到的阻力与挫伤。在这种举步维艰的环境下，周介入先生既想保持文学的纯粹性又想争取大众文化市场的努力就变得非常困难，似乎体现出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悲壮。周先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蔡翔先生在艰难中仍然坚持了刊物的严肃立场，他以关注社会底层与强调思想的特色，使刊物在原有的海派风格中注入了卓尔不群的精神，这一特点从刊物新辟的栏目中可以窥探一斑：“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思想笔记”、“上海词典”等等，加上原有的“批评家俱乐部”、“人文随笔”等栏目，其思想、议论、理论探讨的特色淹过了文学创作的特色，也为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和散文创作留下了独特的篇什。

《上海文学》发表创作有鲜明的特点。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文艺都有它最好的反映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文体样式，这在杂志的编辑风格上清晰地反映出来。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诗歌是反映时代心声最高昂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地底下的民间诗歌的声音，最自由地表达了诗人对时代与未来的真实感怀，显示了文学创作的新的活力。当时的《上海文学》以显眼的篇幅编发大量诗歌，“百家诗会”栏目引人瞩目，1981年是栏目开辟的第一年，就一口气选发了108位诗人240多首诗作和来信，以后又相继改为“当代诗会”、“诗人自选诗”、“八方诗坛”、“上海诗坛”、“东西南北风”等栏目，吸引过全国几代诗人和诗歌爱好者。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中篇小说以适中的容量成为作家们最有成就的文体。这时起，《上海文学》及时编发了大量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像《棋王》、《迷人的海》、《冈底斯的诱惑》、《小城之恋》、《访问梦境》、《女女女》、《烦恼人生》、《分享艰难》等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给文坛带来了冲击，形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1990年代，文化议论类的散文创作弥漫市场之际，《上海文学》适时地推出“经典重读”、“人文随笔”和“思想笔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栏目，在思想议论型的散文创作中堪称一绝，开拓了散文创作的境界和思想深度。而短篇小说，作为《上海文学》的一项主要的创作文体，自始至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上海文学》不是大型文学刊物，篇幅限制了它发表长篇小说和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在及时反映时代信息和审美信息方面总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伤痕文学”时代，金河的《重逢》，曹冠龙的《锁》、《蛇》、《浴室》等作品都是以非常尖锐的艺术语言揭露了文革的罪恶，而陈村的《死》，我以为在今天仍然是反思文革的最好的一篇小说，陈村与傅雷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息的沟通与交流，把一般的时代悲剧上升到生死哲学的境界。“反思文学”时代，我们谁也不能忘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和压抑不住的青春活力被出色地描写出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愚昧野蛮与农村经济的衰败落后的真实揭露，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写出了人性尊严遭受野蛮践踏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些作品即使过了几十年，其艺术魅力并不会因此而减弱。

文学贵在创新，墨守成规不能发展艺术生命。《上海文学》所坚持的文学创新的方向，是对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以及文学语言技巧的全方位的突破，我们所处的时代生活日新月异

地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学艺术只有坚持不断创新和突破，才可能真正形成反映我们当下生活的最好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的创新传统从1970年代初就形成。当时王蒙率先抛出体现新小说文体革命的“集束手榴弹”，以六篇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而震动文坛，其中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海的梦》，我认为是最贴近王蒙创作风格、最自然地表达王蒙一代人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作品。这篇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技巧，为小说叙事形式拓展了新的空间，这在当时苦苦寻找小说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心里造成的震动是连锁性的。后来，在1985年小说形式革命的时候，张欣辛和桑晔发表口述实录的《北京人》，阿城发表集束型小说的《遍地风流》，为短篇小说的审美特征提供了新的内涵；再配上高行健等人讨论现代小说形式的问题，整个儿刷新了小说的审美观念。现在我们创作小说再也不会有意识地去追求现代主义还是什么主义，所有有益于小说表达的技巧都被融进现代小说观念之中，可是在二十年前的文学领域，正如鲁迅曾经形容过的，要在封闭的铁屋子里开一扇窗口，会几乎闹到流血的地步。“与时俱进”这个口号在当时决不是一个时尚，相反，在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学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上海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承受各种压力，而一份杂志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显现出真正的魅力所在。

文学要坚持民间立场，感受民间疾苦，善于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感受真正的美和力量，寻找一种健康的精神力量。我认为这是《上海文学》所发表的创作的第三个特点。1995年10月号上，周介入先生以《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为题发表“编者的话”，对他所倡导的“新市民小说”专栏开设一年来的成绩加以回顾。他认为：在创作上，一批既带有新锐的市民意识又各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和作品相继涌现，如邱华栋、唐颖、殷慧芬、何顿等；在理论探讨上，也由此推动了上海和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如陈思和、李天纲、任仲伦、韩毓海、许纪霖、薛毅等等，对于“市民社会”、“市民意识”、“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非常具有本土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由此提出了一个观察当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这就是除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与“唤醒民众—启蒙范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民间—市民范式”。我没有关心过周先生的“第三范式”提出后是否引起过讨论，但我想这一民间立场的出现，在事实上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和学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行为依据，1993年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试图用文学史上的例子来解释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意义，这以后，关于民间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周介入先生发表我的文章也是希望这个理论主张与他所提倡的新市民小说联系起来，鼓励一种创作倾向。虽然我还没有理清楚两者的关系，但周先生的努力使民间立场成为《上海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1990年代在一片灰色的文坛上，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的发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民间不仅仅是揭示民间的悲苦，同时还有一种能力来揭示隐藏于民间的欢乐和生存力量。我一直记得在许多年前，《上海文学》首任主编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口授过一篇序文，他一字不差地背诵了柴可夫斯基的名言：“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说得多么好！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上海文学》今天走在民间道路上的欢乐所在。

《上海文学》从一开始就坚持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特色。这从文革前的杂志上就鲜明地体现出来。像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在1956年双百方针鼓舞下发表，体现了当时文学理论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尽管这篇宏论发表后遭受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痞恶棍们的围剿，但它对当代文学理论思想的建设和创新意义无疑是深远的，我曾经有意将此与双百方针期间《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批有深刻见解的文艺论文相比较，如《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这些文章更多是着眼于宏观的创作倾向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探讨，而《上海文学》所发表的钱文则更多地深入于艺术创作规律以及对人性的关怀，即使在今天的文学理论领域，我认为钱先生的许多文艺观点仍然是有启发的。这不仅反映了钱先生的学术境界之高，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上海文学》的编者的高深的学术眼光和涌动于心的良知与胆识。1980年代，文艺理论成为《上海文学》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上海文学》的许多理论创新是由爱思索的作家们经过创作实践后提出来的，那时候的作家不像后来的作家那样，以公然与理论相对立为时髦，他们主动思索许多文艺理论的问题，慎重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甚至推动社会与文学的改革与进步。《上海文学》及时发表了这些虽然不成熟但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主张，比如1980年代初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先是在研究领域出现，对创作影响并不大，但是当《上海文学》发表了著名的“三个风筝”的关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通信，立刻引起文坛上巨大的反响。在一种比较恶劣的形势下，老作家巴金、夏衍等人都挺身而出，以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切身的历史教训，抵制了那种企图继续闭关锁国、愚弄国人的言论。关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讨论在1980年代初是一个思想文艺领域的漂亮战役，它既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必然一环，也是推动社会观念改革，澄清如何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思想理论的必然之途，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确定起了振奋发聩的作用。还有关于寻根文学的提出，那次杭州会议的情况已经被许多当事人作了精缜的回忆，不必再讨论细节的真实，但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与《上海文学》杂志有意识组织和提升作家的文艺主张分不开的。在此之前，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贾平凹发表《商州初录》，郑万隆发表《老棒子酒馆》，阿城发表《棋王》，李杭育发表葛川江系列小说，陈村发表《走通大渡河》等，虽然都是无所谓而作，却在艺术追求中出现了相似的审美现象，这就引起一些有心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的有所谓而读。记得当时在会上最热衷探讨这些问题的有李陀、韩少功、阿城、季红真、程德培、李庆西等人，这些理论探讨反过来又推动了文学创作的有意识的追求，如以后出现的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等都可以作如是理解。在这些理论问题的酝酿过程中，杂志的作用是非常鲜明的，它仿佛是一座桥梁，把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文学理论是针对创作实践所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而那些被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也因为能够确实解释某些创作现象而被关注和认可，甚至会对作家们的创作发生实际的影响。我所说的影响不一定是指导性的，但确实存在着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彼此启发、相互补充、共同成熟的事。

理论贴近创作，就必然地要求理论工作者贴近时代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盲从潮流，跟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外国思潮后面折腾。纵观《上海文学》的思想与文艺理论的探索，几乎没有发表过那种故弄玄虚以示高深的伪学术文章，无论在

1985年“新三论”风头正健的日子还是1990年代初后现代流行的时候，《上海文学》都没有为时尚潮流所动，坚持从对象的研究中提出理论的道路。我以为这是《上海文学》理论版最有魅力的地方。坚持从现实出发、从对象出发的理论道路必然使杂志贴近生活矛盾和学术矛盾的尖锐之处，不断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概念，以一种比较宽宏的胸襟与学术视野来鼓励理论领域的创新探索，打破自我形成的藩篱，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上海文学》曾经发表过许多看似与文学无关的文字，形成了它的一个鲜明特点。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论文中，像《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与现代都市文学》等，都是有关20世纪文学史理论的探讨。我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文学史的新概念，几乎都是在《上海文学》这样一家文学性杂志上阐述的，这也许是我个人学术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一批成果，时间跨度已经有十几年，发表的时候也不曾有意识地专门给某一家杂志，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我会把自己最重要的、在文学史研究上提出自己一套新概念的文章都交给了《上海文学》发表？也许在我潜意识里，我是把《上海文学》看作最能表达我的心声的一个阵地。在这个杂志的编辑部里，周介入先生和蔡翔先生都从未对发表我的文章表示出任何犹豫，也从未任意删节和变动我的文章的内容，他们甚至也没有担心过我的一些尖锐观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对我的放心使我对他放心。而他们的宽阔的学术视野也使我竟然心安理得地将一些不是当代文学评论的论文发表在上面。其实这非我个人的待遇，如吴亮提出对城市文化形态的讨论，是作为他的个人小辑的形式发表的，以当时的文化氛围而言，城市文化完全是属于文学之外的话题。在后来的“批评家俱乐部”、“思想笔记”里，学术视野更为开阔，著名的“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最早就是在《上海文学》上发出批判之声。后来对新意识形态的探讨，对纯文学的反思，等等，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仍然可以看作是这一特色的延续。

在文学评论方面，《上海文学》所发表的文章是有鲜明特点的，它们一般不脱离创作实践，能够比较好地关注作家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点，关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现象的发现与总结。文革后的《上海文学》发表了大量的作家论，经过了近二十年以后，证明它所评论和推崇的作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他们刚刚走上文坛展露才华的时候，评论家对他们的肯定和批评，在他们的文学道路发展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这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关系的最好解说。我记得当时王晓明教授在杂志上发表《所罗门的瓶子》一文，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研究，曾经引起作家们的“嫉妒”，虽然是尖厉的批评，但反而使许多作家希望有人来这么“批评”一下。这种批评与后来流行的所谓“骂”派批评和浅薄的“骂”名人完全是两种境界、两个层次上的批评，前者是在充分尊重作家的精神劳动的前提下，相知相交，以诚相待，这就形成了《上海文学》推崇批评的好风气。

我翻阅着厚厚的四卷文选，从这些不同风格的文字中，我深深地为这个刊物所走的维

护文学尊严、伸张文学自由的精神历程所感动，同时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考验：即我主编的《上海文学》杂志将会以怎样一种个性和精神面貌呈现到读者的面前？《上海文学》是有它的传统的，它在读者心目中是一片文学气氛氤氲浓郁的理想绿洲，我当然要坚持刊物原有的高雅品位和文学立场，坚持它原来所坚持的贴近时代生活、敢于创新和民间立场的理想主义道路。文学是需要理想的，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飞翔的哨音，哪一天人类精神不飞翔了，文学也就死亡了。什么是文学理想？如何定义？我想，这还需要在创作实践中去逐渐感受和领悟，但是一本文学杂志让读者握在手里，我希望是如同握着一团理想之火，有催人自省，促人向上的力量，也有批判现实环境，维护人道权利的基本指归。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的读者中间，有谁是在中学时代因为爱好文学而读第一本《文艺月报》的，那么，你们现在已经是心欲不逾矩的老者了；有谁是在中学时代因为爱好文学而读第一期《上海文艺》的，那么，你们现在也已经是人到中年阅尽沧桑了，如果你们现在还站在《上海文学》读者的行列里，那么，我们对五十年的《上海文学》的纪念也正是对你们所走的美好的文学阅读岁月的纪念，也是对五十年来你们对刊物的友情和信任的纪念。如果，有谁在中学时代还是因为爱好文学而读我们新一期（2003年7月号）的《上海文学》的，那么，你们，还有我们，一起来努力吧，一起来开拓《上海文学》的未来的五十年吧。

2003年5月31日初稿于黑水斋

2003年6月7日修改毕

# 目 录

##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上海文学》50年经典》总序 陈思和 / 001

骨 肉	
如 愿	
海的梦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大 坂	
陈继根癖	
老棒子酒馆	
北京人	张辛欣
遍地风流	
归去来	
苍穹下	
一 天	
巨 砚	
葛川江的一个早晨	
继续操练	
旷野里	

胡万春 / 001
茹志鹃 / 009
王 蒙 / 015
冯骥才 / 022
张承志 / 029
高晓声 / 041
郑万隆 / 047
桑 是 / 053
阿 城 / 057
韩少功 / 063
赵长天 / 072
陈 村 / 076
李平易 / 084
李杭育 / 092
李 晓 / 101
残 雪 / 115

毒 药	史铁生 / 118
合 坟	李 锐 / 130
黄 瑶	林斤澜 / 135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苏 童 / 140
马 嘶	谢友鄞 / 147
曲 胡	刘庆邦 / 152
左边是墙,右边是墙	林 白 / 156
快 马	矫 健 / 159
干 沟	杨争光 / 165
瓦楞上的青草	吕 新 / 170
冥 灯	蒋 韵 / 179
太白山记	贾平凹 / 186
新笔记小说三篇	汪曾祺 / 198
群蜂飞舞	阿 来 / 204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严歌苓 / 211
农民军人	阎连科 / 224
约 会	丁丽英 / 234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棉 棉 / 241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 254
上海女人	杨显惠 / 259

# 骨 肉

◆胡万春

一

一九三六年，我还只有九岁。家里除开四个人以外，便只是放在屋中央的一张破方桌，靠墙角搭着的一张板床，和一只当板凳用的空柜子。房子很老了，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窗格子上缺了两块玻璃，妈妈用旧“申报”糊着。往往太阳已经西沉了，桌子上还放着午饭时留下的没有洗过的碗筷；苍蝇嗡嗡地叫着，叮在碗沿上。

妈妈虽然还只有四十多岁，可是她整天愁柴愁米，因此她显得很苍老，头发也有些灰白了，眼角上的皱纹，多、长而又深。爸爸挣钱很少，每到月底，他总得腋下挟一包旧衣裳，去上“当”店。妈妈为了补贴家用，一吃过中饭，连家里也不收拾，就出去帮人洗衣。

每当妈妈出外替人洗衣去，她总叮咛我不要贪玩，要我管好妹妹。妹妹还小咧，刚会扶着床沿走路，会叫我阿哥。我挺喜欢妹妹，她有着胖胖的小圆脸，大大的黑眼珠；妈妈还替她扎了一根红头绳在小辫子上，真是好看极了。我家还养了一只小花猫，它挺调皮，会把两只后脚撑在墙上，头朝下的倒立起来。有时妈妈回家晚一些，妹妹哭了，小花猫就用两只前爪，戏弄着小皮球，跳来跳去的闹着，往往引得妹妹笑起来。因此妹妹也挺喜欢小花猫；有时她还把小花猫搂在怀里，哄它睡。妹妹自己睡着了，小花猫也就伏在她的脚边，蜷起身子睡觉。

傍晚，妹妹跟小花猫睡得真香，我到了这时候，就静静地爬在窗口瞧着，等妈妈回家。我的眼睛总看着远处的后弄口。这已经习惯了。每次妈妈回来，总是从那灰色的墙角转弯，然后慢慢地向着后门口走来。可是我总得经受无数次的失望，从那灰色的墙角间钻出来的人，常常不是妈妈。

在这时候，每一家的后门口，人们往往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手摇着芭蕉扇，翘起脚乘风凉。住在我家附近的高老板，更是悠闲自在，还袒胸露体地喝酒，我一看见他就讨厌。他的胖脑袋光秃秃的，闪着亮光，好像搽过猪油似的。笑起来眯着眼，笑声就像哭声一样；笑得厉害了，连身上的肥肉也会抖动。我记得很清楚，为了没有吃的，妈妈时常强装出笑脸，偷偷地走到高老板的跟前，向他恳求，借几个“印子钱”；有时便是去还利钱。逢到这种时候，高老板便露出了讨厌的黄牙，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时候只有我肯借钱给你，凭良心……这是轻利钱……轻利钱……娘格起

来……。”

“是呀，是呀，利钱再轻也没有了，十元钱给你用一月，只收你四元利钱呀！”高老板娘这时也插了上来。她在太阳穴上贴着两只钮扣似的小膏药，尖鼻子、黄脸膛，手臂膊瘦得像柴梗。她一面替高老板打着扇，一面哼着嗡鼻子，像应声虫似的说着：“这是我家老板有义气，心肠慈悲，才肯借钱给你呀……嘿嘿……。”

谁不知道，高老板是靠着放“印子钱”才发财的，还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呵！我还记得，前弄堂的李家阿姨，就是借了他的三十元“印子钱”，利上滚利，不到一年，就变成一百多，最后她没有办法，就用裤带扎在梁上，上吊死了……。我那时真想不明白，妈妈明知这些，为啥还要问高老板借钱呢？

每次都是这样，妈妈从高老板处回来，暗暗地揩着眼泪……我对这点是知道的，妈妈心里难过着呢！

从场面上看，高老板是做鸡毛帚生意的，后门口放满了柏油桶、竹杆以及腐臭的鸡毛；可是骨子里，他并不靠做鸡毛帚生意赚钱，主要的是放“印子钱”给做小生意的小贩。往往在大清早上，我们还在睡梦中，就被嘈杂的人声吵醒。这无须说得，一定是高老板叫他的徒弟（流氓）打那些还不了利钱的小贩。我看见过几次这样的把戏，那些像疯狗似的流氓，只要高老板一使眼色，就会一拥上前，把那些小贩打得鼻青脸肿，最后还得还钱。爸爸每天到这时候，被吵得睡不着觉，就一边洗着脸，一边骂山门，说高老板真缺德，利钱拼命抬高，把穷人的皮都剥了，还得吃肉……怪不得到了四十几，连一个儿女都没有……。

天黑了，屋子里暗洞洞地。我左等右等，眼也望穿了，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隔壁人家的妈妈，在后门口喊着自己的儿女，快去吃晚饭；但我家连晚饭也没有烧。妹妹醒来了，她哇哇地哭，大概是肚子饿了。我横哄直哄，说什么也哄不好，于是，我也只得哭了。但一想到妈妈说过，做阿哥的哭是坍台的，就勉强忍住了眼泪，又去哄妹妹。

“阿哥！妈……妈妈……。”妹妹把眼皮子也哭红了。

“好妹妹！别哭，别哭，妈妈就会回来的！”我哄着妹妹。

到这时候，我就学妈妈常唱的催眠歌，把妹妹搂在怀里。妹妹哭乏了，也就没再哭，静静地用两只小手玩着我胸前的纽扣。小花猫躺在我脚边，也肚子饿了，直是喵呜喵呜地叫。我一听得隔壁人家的关门声，和后门传来的脚步声，我总试着猜，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我总得这样那样地失望好多次，直等到扶梯上响起熟悉的声音，房门慢慢地开了开来，我才高兴的叫：

“妈，你回来啦！”

“嗯！好孩子，饿了吧？”

妈妈总是擦一擦脸上的汗，理理灰白的头发，嘘一口气，把一只铅桶咚的朝房门口一放，走过来看我一眼，就用手轻轻地抚一抚妹妹的头发。这时候妹妹倒反而哇的一声哭了。

妈妈点亮了煤油灯。妹妹不哭了，接连叫着妈妈。小花猫也活泼了，尾巴翘得老高，爪子拉着妈妈的裤脚管，直打转子。

这时候，一切都好了，我那悬着的心才算安放下来。我觉得窗外的月亮在笑，桌子上煤

油灯的火苗也好像在欢乐的跳跃，整间屋子都欢乐了。妈妈开始烧晚饭，碗筷声叮叮当当叫人顶高兴。妹妹逗着小花猫玩，她直是眯眯笑，笑得她脸上的小酒窝深深的。我快乐的帮着妈妈拎水、端菜、揩桌子、摆凳子。

“阿爸！”妹妹跳着叫了起来。

小花猫也高兴的喵呜喵呜叫了。

我回头一看，果然，爸爸也回来了。爸爸上身穿了蓝布中装褂子，下身穿了补满补钉的破裤子，橡胶鞋也开了口，破得不能再穿了。爸爸有着黑黝黝的脸膛，剃平顶头。他手里拎了饭盒，总是习惯地在房门口站一站。这时候，他总先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拿出两块麻酥糖，妹妹一块，我一块。我拿了糖，舍不得吃，仍用纸包了起来，因为明天爸妈不在家，妹妹哭了，好哄哄妹妹。爸爸在这时候算是最快乐的了。再过一下，他又摇头叹气。因为厂里正在裁人，怕万一被裁了，丢了业，一家四口没法生活。爸爸显得苍老多了，脸上皱纹越来越多，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了。爸爸做过轮船上的火夫，做过铜匠，做过救火会的仆人。有时爸爸高兴，就讲航海故事，我抱着妹妹，静静地听着。

吃过晚饭，一家都睡了。

月亮光打从窗口射进来，妹妹在甜蜜的睡着，她那胖乎乎的小手，靠在妈妈的脸上。我睡在地铺上，爸爸睡在我身旁，总轻轻地替我盖好被子。

## 二

有一天，妈妈总算给我们盼望回来了，可是爸爸还是没有回来。

煤油灯里的火苗跳跃着，屋内忽明忽暗。小飞虫绕着灯光嗡嗡叫。卖馄饨面的梆子声也笃笃地过来了，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妹妹睡在床上，小鼻孔轻轻地扇动着，时时拉开嘴笑，大概是在做着美丽的梦吧！

“唉！快十一点钟了，你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左眼皮别别跳，一定出了什么事啦！”妈妈放下了针线，朝着我忧愁的说。

“我们去看看爸爸吧！”我急忙说。

妈妈听到我这么说，先是呆了一呆，接着叹了口气，就下了决心似的，抱起了妹妹，拉了我的手，关了房门，走出了弄堂口。街上的店门都已关得铁紧，冷清清的，只有几个乘凉的人，还坐在打瞌睡。天空连一颗星星也没有，漆黑一片，凉风迎面吹来，吹得我直打寒噤。妈妈抱着睡着的妹妹，我拉着妈妈的衣角，朝爸爸的工厂走去。走得不远，几颗雨点滴在我的脸上了。

“妈！快走吧，已经下雨啦！”我对妈说。

“唉！天老爷也不帮忙。”妈又叹了口气。

我们走了好久，慢慢的看见了工厂。这时，雨已经下来了，我的衣服也已经湿了。街上更显得昏暗，连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黄包车偶然在路上拉过。忽然，我看一个人踏着蹒跚的步子，跌跌冲冲的迎面走来。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好像很熟悉。但我听妈说过，夜里走路，

常会碰到拦路贼的，要抢衣服。

“妈！有人！”我惊慌的说。

“不要响！”妈捏紧了我的手说。

对面这个人，越走越近来了，看样子好像吃醉了酒。这个人慢慢的走到近前，我渐渐认出来了。妈妈突然放了我的手，大声说：

“啊！是你？”

“是爸爸！”

爸爸身上发散出一阵一阵难闻的酒味，他抚了抚我湿漉漉的头发，看了看妈，嘴唇动了动，连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我仔细地看了看爸爸，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好像一个病人。爸爸领着我，走了一段路，阴郁地说：

“我失业了！”

“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呵！！”妈妈伤心地哭了起来。

爸爸痛苦的咬了咬牙，把我抱起来，叫我坐在他的肩上，走得很快。

天空电光一闪，一声霹雳，大雨顷刻哗哗而下。路旁的梧桐树，被狂风吹得摇摆不停。爸爸像疯了一般，飞快的奔了起来。我吓得抱紧了爸爸的头直喘气。妹妹哭了，妈妈跑不动，爸爸还是拼命的奔。跑了一会，只听得后面妈妈在叫：

“等一等啊！”

爸爸放下了我，脱下身上的衣服，等妈妈走近，就把衣服包在妹妹的身上。妈妈披头散发的，脸色发白，喘着气，把妹妹给了爸爸。妹妹冷得嘴唇发青，直是哭、叫，连嗓门也哑了。狂风吹来，暴雨也扑面的滚滚而来。我冻得直是索索抖。

“这种日子还有啥过头，我们都去死吧！”妈妈咬着牙说：“反正要饿死的！”

“哼！废话。”爸爸狠狠的说。

我知道爸爸失了业，今后的生活会更苦的……唉！我们又奔了起来，妈妈在我背脊上摸了摸，轻轻地问我：

“冷吧？”

“嗯！”

雨越下越大，连阴沟水也满了上来，街道上都是水。妹妹被雨水打得直打冷噎，低低的哭着。

“轰隆隆”，又是一声霹雳，照得世界铮亮一片，我看爸爸跟妈妈的脸色都是铁青的。

“唉！这个年头真要造反喽！”爸爸说。

### 三

妈妈坐在床沿边，手轻轻地拍着妹妹。小花猫一声不响，低着头，两只眼睛像要打瞌睡似的，蹲在妈妈的脚边。我玩着香烟牌子，坐在窗口旁边。我觉得妈妈老了，白头发更加多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加深了。屋子里静悄悄地，都不想说话似的。爸爸精神颓丧地走回来，

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了看妈，把两只手一摊。妈妈失望地低下了头。

正在这时，隔壁的高老板娘走了进来。我呆呆地看着她，觉得奇怪，她的鼻子竟会是这样的尖，就好像是老鹰的嘴巴似的。她向爸爸点了点头，打从尖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奸笑，用手帕掸了掸凳子，慢慢地坐在妈妈的身边，说：

“喔唷！像有心事呀！”

“唉！苦命人嘛！”妈说：“欠你的钱怎么办啊！”

“那也不要紧，嘿嘿……高老板近来生意也不大好，要不是，钱倒无所谓……世口真紧呀！”高老板娘的黄脸一紧，太阳穴上的小膏药也几乎落下来了。她假惺惺的说：“……我也说过，近来你们困难，不过钱总是要还的……。”

“我们现在连利钱也付不出，哪来的钱还本呀！”妈妈苦着脸说：“……他爸爸又失业，这个年头太坏喽！”

“嘿嘿……是嘛，我也这么想。不过高老板发起脾气来，你们是知道的，连我也吃不消。……”高老板娘面孔一下子沉了下来，朝着爸爸说：“去想想办法呀！”

“人也快饿死了，哪来的钱？”爸爸不客气的说。

“是嘛，你们一家四口，有两个孩子，你又不挣钱，是困难哪！高老板说，他倒很想有一个孩子，可是没有福气。”高老板娘说完，看了看爸爸的脸色，站起身来说：“你们的小妹妹倒也生得满好看，要是高老板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他可乐啦……钱嘛，小意思。”

高老板娘偷偷地看了看妈妈，身子一扭一扭的走了。

“唉！真他妈的见鬼。”爸爸跳起来说，“借他们五十元钱，一个月光是利钱就得给二十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妈妈呆呆地瞧着妹妹，泪珠像断线珍珠似的挂下来，咬了咬嘴唇说：“媛媛多乖巧呀，还只有一周岁多点的人，会说会笑的……你不在的时候，她爸爸、爸爸地直叫……这么鲜龙活跳的人……人真狠心啊！他们要我们骨肉分离呢。”

“高老板是地头蛇，有钱有势……不还他钱，我们还能做人么！”爸爸双手捧了头，坐在小凳子上。

我还不明白爸爸跟妈妈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不能将孩子送人。”

“还不是到头来病死，饿死！”

“这是亲骨肉呵，我没有她，活着做人还有啥兴趣。”

“本来就没有兴趣了！”

“你黑心肠！”

“唉！人心是肉做的啊，只怪这年头太不好了！”

天夜了，家里没有点灯，月亮在云堆后面藏着，窗外黑糊糊的一片。壁上有小飞虫撞着，吱吱啪啪的响。妹妹睡着，妈妈像木头人一般的坐着，爸爸托了头靠在方桌上。

夜深了，屋内像死一般的静寂。

我睡着了，梦见高老板凶恶的抓着爸爸的衣领，向爸爸要钱还。爸爸脸涨得血红，怒气

冲冲的给了高老板一拳，高老板像只元宝似的仰天一跤，跌在地上。爸爸苦笑着，抱起了妹妹便走。高老板忽然拿来了一把铮亮的菜刀，追到爸爸的背后，举起手来，一刀……。我哇的叫了起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屋内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

我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过不久，我好像听见妹妹在哭，而且哭声是从窗外传进来的。

“妈妈！妈妈！”妹妹凄惨的哭叫着。

“唉！你不要叫妈了！孩子，去过好日子吧！”妈妈哽噎着说。

我跳了起来，只见屋内油灯里的火苗在孤独的跳跃。

“你妹妹到高老板家去了！”爸爸痛苦的说。

我哇的哭了起来。

## 四

我们付不起房钱，搬了家，住在一间阴暗的阁楼里。妈妈还是日夜出去替人洗衣；一个月挣的钱，只能买到四斗米。爸爸终日奔跑，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可是总找不到职业。小花猫在搬场时扔了；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抱了它，走过了三条马路，放了它，转身就走……。

晚上我们睡的是地铺，三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也不容易。妈妈常在半夜里想起了妹妹，轻轻地哭着，有时抽抽噎噎地直到天亮。早晨妈妈照常出去替人洗衣，爸爸就给我够买一只大饼的钱，算早餐。有时我坐在地铺上，想起了妹妹，连大饼也吃不下了，就哭着问爸爸：

“爸爸，为啥要把妹妹送人呢？”

“唉！孩子，爸爸也不愿意将妹妹送人呀！”爸爸抚着我的头，痛苦的说：“我现在只希望你永远也别离开我……孩子，我不明白，做父母的都是疼爱自己的子女的，把你妹妹送人，那是不得已呀……孩子，等你长大了，生活一定会好的，再不会像你爸爸现在这样了……我们穷苦的工人受不了喽！你爸爸真恨死这个世道啊！……。”

我把头埋在爸爸的怀里，爸爸轻轻地摸着我的背脊，把头转向别处，喃喃地说：

“将来的世道一定会好的……。”

“爸爸，我去看妹妹吧！”

爸爸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就穿了衣服，一声不响地走了。

我日夜想念我的妹妹，白天在马路上逛，晚上就跑到从前住的地方，站在高老板家门口，看着他家窗口里射出来的亮光。我们老早住的那房子，门口漆黑一片。高老板家的灯光，倒是挺亮的。我希望能在他的窗口前看到妹妹，可是窗口挂着窗帘，又放着花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抬头看着看着，头颈酸了，就在街上兜。我不想就回家，过一忽儿，我又走到高老板家的门口，直等他家灯光熄了，窗子也黑了，我还孤零零地站在黑暗里。有一次，天下着细雨，我又去了，等着等着，细雨淋湿了我的衬衣，我抖着，觉得寂寞和凄凉。

忽然我好像隐隐地听到了妹妹的哭声，我的心里难过极了，心跳得很厉害，我慢慢地鼓